**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赵殿武

91年前的一个夜晚，江西吉安，赣江之滨。一位19岁的小伙子拉住哥哥的手嘱咐道：“哥，这次一走，不晓得将来如何，你多生几个儿子吧!”之后便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奔赴革命前线。谁曾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他再也没能够踏上家乡的热土，再也没能够和亲人团聚。而那句嘱托也成了他留给亲人的遗嘱，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般的悲壮，留给亲人无尽的思念和悲伤。而当我寻访到他的亲人并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到这令人刻骨铭心的肺腑之言，我的眼前常常浮现那兄弟诀别时的画面，这画面令我感到揪心和难忘。这种揪心和难忘积郁已久，一直想写一写，作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以告慰革命者的英灵。我想写的这位小伙子，就是日后的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烈士。

说起来，我和彭德大烈士“结缘”已久。还在25年前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全班清明节到大青山革命公墓扫墓，展厅里他的大幅黑白画像和他的革命事迹深深震撼了我，那一次就记住了他很特别的名字。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在我的人生之路还能有幸走近这位著名英烈。2013年和2014年，我两度受自治区党史研究室之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历史》（第一卷）和《内蒙古抗战史》评审会，在审读书稿时，看到彭德大烈士牺牲在明安滩的记述，深感地点过于宽泛不太清晰准确，再查相关史志资料，有关烈士的牺牲地和安葬地竟有不同说法，这使我萌生了寻访他的牺牲地，把这些情况彻底搞清楚的念头。我想，这件事我们这代人不搞清楚、不来做，那么下一代人想搞都很难搞清楚了，想做都没有机会了。这念头随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到来愈来愈强烈，终于，在《北方新报》首席记者泊寒兄的热情支持下，我们于2015年4月18日踏上寻访之旅。

在彭德大烈士牺牲75年之后做关于他牺牲情况的寻访不是一件容易事，困难在于很多知情老人已经过世，存世有关史料稀少。但是不管怎样，这件事也要做，不能再拖了。幸运的是，我们在土左旗察素齐找到了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抗战时期大青山里的著名开明人士杨广德之孙杨子文老先生，他是我们已知见过彭德大烈士的唯一健在者，已84岁。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居住在杨家西沟的杨广德一家给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仅粮食就捐献了几万斤。中共绥西地委驻地就在杨家大院，作为大青山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绥西地委书记的彭德大跟杨广德全家相处亲如一家。当时已经懂事的杨子文对这些印象深刻，他深情讲述了他记忆中和蔼可亲的彭主任，讲起日伪军对他们杨家烧杀抢掠的疯狂报复，讲起叛徒胡定良对杨家的残害，讲起彭主任牺牲时杨家献出老祖母的松木寿材，讲起杨家冒着生命危险为彭德大烈士秘密守坟上坟，讲到动情处不禁老泪纵横，连说“彭主任，可好的人哪!”那一次，我们冒了很大的险，接这位八旬高龄的老人上山，一起寻访，实在是不得已，因为他是唯一的知情人，只有他亲自去，这次寻访才有其准确性和非同寻常的价值。

那一天，微雨之后，我们直接从陶思浩进山。当时大地刚刚泛青，白石头沟山口处云雾缭绕，景色奇瑰，非常罕见。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充满遐想，难道这历史迷雾有待我辈解开乎？车在两侧高耸悬崖绝壁的沟里穿行，看着摇摇欲坠的山石和仅容车轮的崎岖山道，心里颇捏了一把汗。艰难行驶近两个小时出了山谷，眼前豁然开朗，到了一个名叫一前晌的地方，心才放下来。一前晌，民国时期尚是地图上一个有名的村子，而今只剩两户人家，杨家西沟就在一前晌的不远处。在大山里，手机信号皆无，我们未做停留，径直前往杨家西沟。

杨家西沟虽是一条不太长的小沟，但是路很不好走，我们上坡行车几公里，在一个较宽的空场处停下来，再往上已经无法行车，只能步行。这个空场处其实就是绥西地委驻地杨家大院的旧址，已经被盗采煤炭的机械挖的乱七八糟，难以看出旧日的一丝痕迹，只有陡坡上不远处的杨家老坟地和几棵老树能够让人感觉到昔日的变迁。杨子文老人不顾年迈和我们一起爬山，看到他气喘吁吁，真有点担心。过去有的书中说彭德大烈士牺牲后就安葬在杨家院子后面，到了山上，我们才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我们走走停停，不住地问杨老，他均说不是，指向西面的沟里。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杨家西沟的沟头，那里也被挖掘机挖得千疮百孔。毕竟几十年没回来了，加上地形地物遭到破坏，杨老也一时有点发懵。正待失望间，杨老环顾四周，突然指着一处土坡说道：“就是这里。”又指着北面的一个小山说：“彭主任的坟地后面正好有个大个尖（即很陡的小山）。”杨老接着说，此处沟头叫老虎沟，东面正对的远山叫麻崖岭。这也令我对文献记载有了新的认识。所谓彭德大烈士埋葬在“老伟沟下”的说法显系出版时编辑误将草写的“虎”字误作“伟”字；所谓葬在黄麻岭下一说应是忆者对地形地物的印象模糊所致。杨老还告诉我们，1951年，3名解放军战士奉命到大青山里寻找彭德大烈士的遗骸。他们在武川县人字号村打听到了为躲避追杀被迫逃难到此的杨家后人，是杨子文带着那几个战士到山里起出彭德大烈士的遗骨，每人背了一个兜子背下了山。我们对杨老指认的地点进行了可参照性拍照，为历史留下重要记录。此时夕阳西下，我们遂赶紧下山。我们在黑夜里向北在大山里穿行，已经分不清到了哪里，直到晚上八点多才从北山口出山，到了固阳县下湿壕。在那里住宿，饱餐了乡村小饭馆地道的羊杂碎之后，使我们消除了一天的饥劳。所以选择此路线，不仅为了安全，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探访彭德大烈士的牺牲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即出发，前往下湿壕西南两三公里处的小帮浪村，1940年3月29日，彭德大烈士就牺牲于此。关于彭德大烈士牺牲情节，文献资料和村民记忆有所出入。文献记载彭德大主任指挥部队与顽军作战时不幸中流弹牺牲，而村民记忆则是彭主任患感冒在村后的山洞里养病时，被村里当兵的陈某探亲时得知，陈半夜潜出村子告密，天亮时敌人偷袭，彭主任与敌激战时牺牲。因当年负责照顾彭主任的高家老太太及其儿子高新宽已经去世，最重要的线索中断了。我们只在村里找到一点重要外围线索，证实陈某确实在敌人部队里当兵，并在解放后因涉嫌告密之事被关押多年。对于陈家告密一事，在这个小村子里仍是人所共知的历史记忆，顾忌到邻里关系，大家都不愿意和陈家提及这个话题。由于行政区划变迁，加上陈某是个小人物，案卷材料已难查询，继续追踪此事几无可能，也就不了了之，至今感到怅然。

在大青山里完成寻访之后，接着寻找彭德大烈士遗骨的下落。杨子文老人只知道当年3个解放军战士背着兜子带走了彭主任的遗骨，至于这几名战士是谁派来的，去了哪里，他已经记不清了。根据《吉安市志》《包头市志》的明确记载，我分别电话咨询了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张家口烈士陵园，没想到，园方回复并无安葬彭德大烈士，我担心排查有误，几经核实，终于确认此事。两部志书记载和实情不符既令我十分震惊又令我十分困惑。彭德大烈士的遗骨究竟在哪里？于是我只能像破案一样继续追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突然看到《绥远日报》1950年版上一则绥远省政府关于通令各县寻找革命年代牺牲烈士遗骸的报道，令我茅塞顿开，于是我的目标瞬间转向内蒙古革命公墓（即原大青山烈士陵园）。令人欣喜的是，经向园方咨询，确认彭德大烈士的骨灰安放在该公墓。第二天，我即前往内蒙古革命公墓，再次核实，“眼见为实”才真正放心。我为革命烈士生平历史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园方的热情支持，在第一存放室，当我见到彭德大烈士的骨灰盒冷冷清清安放在那里，不像其他人那样灵前摆放着鲜花和祭品，想起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那句老话；想起他十几岁远离家乡，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又奔赴内蒙古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英勇牺牲在抗日前线；想起他一辈子没结婚，没留下子嗣，连他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想起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不禁十分沉重和伤感。遂在这里向彭德大烈士三鞠躬，表达作为后来人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我根据考证的结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在当年召开的内蒙古史学会年会上，我受邀作了报告，讲述了调查情况，受到了内蒙古史学会会长白拉都格其教授等专家的赞赏和高度评价，认为我通过田野调查推进了历史研究，填补了空白。我撰写的论文在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内蒙古党校、内蒙古社科联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研讨会上获得二等奖。更令人欣慰的是，远在江西吉安的彭德大烈士的亲人从网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和相关报道，非常激动。他们寻找亲人下落几十年，终于知道了烈士骨灰安放地点，促成了他们的寻亲和祭扫之旅。2019年8月，彭德大烈士的过继子彭继钢老人在子女陪伴下，千里迢迢来到呼和浩特，祭奠亲人，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失散多年的亲人，在香火和鲜花前，终于实现“团聚”。这一切，虽然来得太迟太迟，但终究是令人欣慰的。

一晃之间，五年已经过去，我对彭德大烈士的研究和关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深深感觉到，英雄和烈士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柱石，他们的生命和精神是一个社会的最高贵的存在，我们生者有责任传承和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用心用情表达我辈对他们的尊崇和纪念并体现在自觉的行动上。所以在党史学习教育之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要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更要为英雄烈士办实事。彭德大烈士生平信息多年来存在的出生地和牺牲地用法不同问题一直是我非常关注并推动解决的大问题。因为江西省党史资料中记载为彭得大，内蒙古党史资料里记载为彭德大，两地“各执一词”，导致某权威大辞典同时收录，误以为两个人。资料显示，彭得大这一姓名在原始档案文献比较多见，而彭德大这一姓名系1970年后有关著作中才出现，属于约定俗成，并被广为人知。至于烈士在族谱上的姓名记录为彭文汰，仅限于家族周知，被刻在家乡祖茔衣冠冢的墓碑上。对于彭德大烈士离开家乡后使用的姓名，家族人根本不知道，无怪乎他们解放后几十年难以寻找到亲人下落。对于多年存在的老问题，亟待统筹解决，以避免人们认知上的混乱，有利于学习和纪念。

在烈士生平信息中补充几个字，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无论是烈士褒扬纪念主管部门还是党史部门，对此都十分慎重，谁也不敢轻易开这个口子。但是烈士生平信息的补充完善关乎其本人的权益，烈士们的权益必须有人来维护。经不懈努力和持续推动，内蒙古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采纳我的建议，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历史》（第一卷）中增补注释，明确彭德大“又名彭得大”。内蒙古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呼和浩特退役军人事务局也受理我的意见建议，同意根据党史表述，对烈士纪念场所关于彭德大烈士的生平信息作出修订。

回想六年来的人生路，我所以持续关注彭德大烈士并努力为彭德大烈士张罗一点身后事，就是源于我无法忘却他义无反顾告别亲人投身革命的场景和那催人泪下的遗嘱。这无法忘却的一切时时鞭策着我，促成了我执着的纪念行动。这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辈对英雄和烈士的深切怀念和深深敬意，也是为了唤起社会对英雄和烈士的关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期望，英雄和烈士的革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和民族精神之根，我们必须守护好，这是我们生者和后来人要牢记的使命。